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九一一期 ——
(二〇一三年九月二十三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1309c)

【往事非烟】	我亲历的“揪彭德怀行动”	永 迪
【史实辨析】	为地质学院造反派说几句话	阎长贵
【史海钩沉】	师道之殇：陈毅之子为文革道歉的史实背景	谌旭彬
【劫后反思】	良知的拷问（选载之十一）	孙怒涛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往事非烟】

我亲历的“揪彭德怀行动”

• 永 迪 •

聂树人在《“抓彭德怀指令”来自何人》一文里说：“市场上，描述‘抓彭德怀’的具体过程有许多版本，却没有‘地质东方红’红卫兵的版本。据此可知，书市中关于‘抓彭德怀’的绘声绘色的文字会含有多少水分！”（见本刊 z k 0 5 0 6 d ——编注）

我作为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红卫兵“抓彭德怀行动”的参与者，愿意提供这一“版本”中我所了解的内容。

◇ 王大宾遇到突然情况

当时我是北京地质学院 66 届学生。1966 年 12 月，我和几位同学步行串联到重庆。16 日晚，我们去到“北地东方红”驻渝联络站。联络站设在中区临江门附近沧白路街边的一座小楼（文革前的重庆市政协办公楼）里。上楼的时候，偶然遇到北地东方红负责人之一的王大宾，他很热情地招呼我。我和王都是 1961 年考入北京地质学院的四川老乡，文革前就比较熟悉。他问我从哪里来，我说从成都来，王大宾立即表示有要事和我谈。

在二楼的一个会议室里，王大宾告诉我，东方红驻成都联络站和驻重庆联络站都接到朱成昭（北地东方红的主要负责人）从北京打来的电话，传达党中央、中央文革的指示，要我们把彭德怀揪回北京。他问我：“听说彭德怀在成都，不知道他住什么地方，有没有可能藏在军区大院？”我母亲在成都军区作军医，我们家就一直住军区大院。王大宾向我提出这样问题，当然因为彭德怀是元帅、曾担任国防部长，很自然会想到他在成都会住我所熟悉的军区大院。

我告诉他：“成都军区机关已经开展‘四大’，大院内战斗队林立，抄家之风盛行。军区主要机关分布在北较场和西较场，还有一些直属单位分布在成都各地，这么大的范围要藏个把人不难。但是，彭德怀这样的大人物，要安全保密地藏起来很难，除非军区领导对他采取特殊保护措施。可是司令员黄新庭、政委郭林祥已经被批斗了，主要罪状是紧跟贺龙、罗瑞卿执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他们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没有心思也没有能力去保彭德怀这样的‘死老虎’，彭德怀如果还藏在军区大院，早就被机关的战斗队抓出来了。”

王大宾将我介绍的情况详细记录在本子上。还告诉我，说他10月下旬和十多位同学到外地串联，准备先到韶山和井冈山，然后沿红军长征的路线步行。可是他在火车上生病了，只好在武汉下车，住了一个多月的医院。上大学后就没有见过面的母亲知道他生病了，一定要他回老家德昌养病，于是他买了船票回四川。不想遇到这么一个突然情况，要他在四川抓彭德怀。

那么，彭德怀怎么到四川的？到底谁要把他揪回北京？

◇ 中央指示的由来

1965年9月，毛泽东亲自找彭德怀谈话，要他到四川任三线建设指挥部副总指挥（总指挥是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本来彭德怀是不愿意去，毛泽东为让彭德怀能接受安排离开北京，当面甚至还说了“也许真理在你那一边”这样的话。彭德怀于当年11月28日下午离京赴川。在他行前的11月10日，由毛泽东亲自布置江青组织炮制的影射彭德怀搞翻案的文章——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已经在上海《文汇报》发表。此文后来被视为点燃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11月30日，即彭德怀到达成都当天，《人民日报》转载了姚文元此文。一到成都就忙于工作的彭德怀是在12月4日才看到的，当即大怒，说这是打了自己一耳光（王春才《元帅的最后岁月——彭德怀在三线》，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5月）。但他不知道，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谈到这篇文章时又说了：“缺点是没有击中要害。《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嘉靖罢了海瑞的官，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就是海瑞。”

1966年5月27日，彭总正在前往贵州六盘水的路上，车到四川大足县被西南局三线建委以传达“五·一六”通知精神的名义召回成都。传达会很快变成了批判会，会上，有人指责他“到处放毒”、“收买人心”、“小恩小惠”、“伪装艰苦朴素”、“攻击毛主席，攻击‘三面红旗’”、“翻案”等等。彭德怀说明、检讨，3次不能过关。继而，又追问彭德怀和彭真的关系，要彭德怀交代“反党小集团”和“里通外国”问题。会后，西南局书记处指示，以简报的形式向中央文革报告批彭的情况，并将这一简报在党内各级组织传达。（参见《彭德怀全传》电子版：五、梦断三线（8））李井泉的小报告一箭双雕：既证明他贯彻了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又表示他已经和彭德怀划清了界限。

1966年12月13日，在周恩来等人召见首都几大院校红卫兵领袖的会上，江青突然说：“你们不是很能吗？你们为什么不去抓海瑞？听说他在四川经常上街看大字报，与人谈话，很逍遥自在么！应该把他抓回来，要他交代问题，接受群众批判！”（聂树人《“抓彭德怀指令”来自何人》）

1966年12月15日，戚本禹又对北航红旗的负责人韩爱晶说：“告诉你们，彭德怀现在在成都，是三线副总指挥，在那里没有人敢动他。要把他抓回北京，打倒在地。这是首长的指示，已经毛主席同意。”（参见《千秋功罪毛泽东》，辛子陵著，香港书作坊2007年7月电子版）

当年的中央文革成员王力在其所著的《王力反思录》中提到将彭德怀从四川抓回北京是在周总理主持下召开会议决定的，书中这样写道：“我从秦城出来后，北京市公安局的同志来找我，他是王稼祥的女婿。他坦率地说，判戚本禹判不下去，有些事情难定。如到四川揪彭德怀，戚本禹说他是执行中央的决定，是中央开会，总理主持作的决定。我说，中央开会我都参加的，这个会我没参加，大概不是中央的会，是专案组的会。他们说问过汪东兴、杨成武，是不是中央的决定，他们说是的。”（《王力反思录》，香港北星出版社，第730页）

这就有了朱成昭接指示后给北地东方红驻成都和重庆的联络站打电话，传达中央揪彭的指示的事。

◇ 王大宾决定暂不揪彭

王大宾到了重庆联络站才知道中央指示，于是决定：在渝的同学除办展览的留下，其余全部到成都集中。同时又通知在成都联络站的同学，抓紧时间了解彭德怀的下落，准备行动。

12月18日，在四川省地质局会议室。北地东方红在四川联络站的几位负责人：钱辛、王大为、谭保华、陈保堂、张华清、郑文卿等，向王大宾详细汇报了几天来的进展。正在众人寻找彭德怀而绞尽脑汁时，郑文卿巧遇彭德怀在街上看大字报。据郑文卿介绍：他和另外一位同学根据彭是三线建委副主任的线索，专门到三线建委办公地门外守候。守到天黑，看见一老一少从三线建委大院出来，年老的有点像彭德怀，于是紧随其后。这两位一路走一路看大字报，捡传单。因为天黑看不清人的面目，郑文卿跟得很近听到了老者的咳嗽声，由此判断老者感冒了，可能会到药店买药。于是他抢先来到附近的药店。这一老一少果然进来买药，郑文卿在灯光下清清楚楚辨认出这位咳嗽的老者就是彭德怀。

郑文卿回来一汇报，钱辛、王大为等人很高兴，决定找彭谈话。第二天来到彭总住地，彭和身边的工作人员很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彭总很希望与红卫兵交流。话题范围很广，从他当放牛娃开始谈到领导平江起义，再到井冈山和朱毛会师的过程，谈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历次重大战役的情况。话题的重点主要围绕庐山会议和文化大革命。彭总反复强调他不反毛主席，说他和毛主席的争论是建设速度快一点还是慢一点的问题，毛主席的话不说100%正确，也是99%是正确的。（我们注意到，彭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说过：毛主席的话是最高指示，是马列主义的顶峰。）谈到文化大革命，彭说：他拥护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对于反修防修非常必要，群众发动起来了，通过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辨明是非，非常正确。他不怕群众，不怕红卫兵。此前，西南局保卫部的领导劝他到内江躲一躲，他坚决不去，他说，那有共产党怕群众的道理。还说庐山会议后长期闲居在京郊吴家花园，盼望为人民作点事。谈话的气氛友好，我们的人还不断起身给彭总的杯子里掺水。谈到大串联，彭总对着地图给我们的人指长征串联的路应该怎样走，路上要注意什么事。谈话结束时，彭总把大家送到门口，并表示欢迎再来。钱辛将谈话记录交给王大宾看，谈到“老头子”（即彭德怀，下同），都说印象非常好。‘老头子’畅所欲言，对自己的功过认识很清楚，是个很直爽的人。

是否揪彭？有两种对立的意见。反对揪彭占主流，王大为（北京地质学院探矿工程系团总支书记，最早加入北地东方红的教师之一）的发言最有代表性，他说：“‘老头子’是革命功臣。

刚到四川一年，表现很好。最重要的是‘老头子’拥护毛主席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支持红卫兵运动，赞扬青年学生的革命精神。认为发动文化大革命对防止共产党脱离群众很有必要，中国有希望，过去解决不了问题，现在可以解决了……‘老头子’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比我们还深刻，他不仅支持红卫兵而且理解红卫兵的过火行为。他还强调：你们要注意政策，要团结多数。”王大来还说：“庐山会议的事是老账了。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讲的是实际情况嘛，高指标、浮夸风就是不对，亩产万斤是吹牛，下面的人欺骗毛主席，‘老头子’讲的才是真话。在‘老头子’面前我们没有批判能力。”

听到这里，王大宾有感而发，他说：“1958年高一，我当班长带领全班同学种试验田，挖地3尺，积肥十万斤，誓要小麦亩产上万斤。在生物老师的指导下，一亩地播了60斤种子，结果收了不到200斤，全班同学在试验田大哭一场。”

经过一番辩论，双方都认可由王大宾作最后决定。王大宾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我们根据实际情况办事。‘老头子’又没有什么新问题，他拥护毛主席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支持红卫兵运动。可能党中央和毛主席还不了解他现在的情况，他又不是刘少奇司令部的人，不忙去抓。”

会上决定暂不执行中央指示，派王大来、郑文卿立即飞回北京汇报，重点讲明彭德怀拥护文化大革命的情况。

◇ 来了个钦差大臣

12月22日上午11点，东方红总部派“作战部副部长”胡乐成飞到成都。胡乐成身着军大衣，趾高气扬，盛气凌人，俨然一副钦差大臣的架势，一到会议室就开骂：“你们都是饭桶！右倾机会主义！连彭德怀都揪不回京！我奉中央指示：立即把彭德怀揪回北京！”他还传达周总理给朱成昭的三点指示：“一，为了确保安全，彭德怀同志回北京不能坐飞机只能坐火车；二，要和成都军区一起护送，途中要确保安全，随时向中央报告；三，不要在成都开批斗大会。”

胡乐成自恃有尚方宝剑，对众人嗤之以鼻，也不把王大宾放在眼里。他宣布：“中央首长说：王大宾犯了严重的右的政治错误，被彭德怀征服了。”

胡的宣布使会场炸了锅，场面一时混乱。

王大宾站起来反驳：“我是东方红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就是地院的老保也尊重我的人格，轮不到你来骂我们是饭桶。我们按照党的组织原则办事，没有执行上级指示，及时向上级汇报了没有执行的理由，这有什么错？你是钦差大臣，这事我不管了，你自己办好了，我要回家看老母亲去了。”

在场的师生大部分支持王大宾，对胡乐成的骄横极为不满，双方争执不下。此时，探工系的刘志耕老师出面相劝，他说：“这是大事，千万不得有半点差错，万一出点什么事，你王大宾是没法向中央和总理交代的。”

刘老师的提醒使大家冷静下来，揪彭是中央的决定，不办不行。既然胡乐成是专门来办这个事的，就由他负总责，我们配合他安全地把彭总护送回北京。为了落实总理的三点指示，当时还决定由谭保华、陈保堂、张华清立即去成都军区联系护送事宜；由地质局机关车队队长徐彬和地院同学一起去成都铁路局联系回北京的专列。

下午，谭保华等人回话：成都军区已得到总理指示，决定由军区的一位二级部长负责与地

院学生联系，成都军区派部队护送彭德怀回北京。铁路局也同意：安排专列送彭回北京，地院的学生可以同车前往。王大宾准备事办完就回老家德昌养病。

◇ 揪彭中的波折

12月23日凌晨约3点。我正在睡梦中，感到有人在耳边喊：“快！起来！去抓彭德怀！”听说抓彭德怀，我像弹簧一样跳了起来，这时房间已灯火通明，旁边的几位同学也都兴奋地爬了起来。

天漆黑，寒风嗖嗖。一辆“嘎斯51”苏式卡车在路上疾驰，凭直觉判断车子正往城里开，不到20分钟停在了一条小胡同。我观察周围的建筑，很快认出这条街是永兴巷，永兴巷长不足200米，北东南西走向，街的西边可以看见位于署袜街的成都市邮电局，那是一栋由英国人建于1901年的很有特色的西式建筑，在一片低矮瓦房的胡同里鹤立鸡群。永兴巷7号是西南局三线建委办公的地方。

进永兴巷7号的大门往东大约30米还有一道小门，里面是占地约一亩的小院，大树的遮掩使小院显得很幽静。靠北有一栋别墅式的小平房，只见小平房客厅的大门洞开，昏暗的灯光照着一个人的身影，走过去才发现那人正在用手绢擦眼泪。我猜是一位三线建委的工作人员，后来才知道他是彭德怀的秘书綦魁英。客厅里空空荡荡，客厅东侧是彭德怀的办公室兼卧室，卧室里摆着一张普通的办公桌、一把椅子、一张部队营房里常见的硬板床，我特别注意墙角放着一只箱子。除了正在伤心啜泣的綦秘书，房里不见有其他人，我问他：

“彭德怀在哪里？”

“人已经被你们抓走了！”

“被谁抓走了！抓到什么地方去了？”

“不知道！”

我很吃惊，彭德怀被谁抓走了？除了我们北地东方红谁还会把他抓走？此前，彭德怀已被我们东方红的人盯上了，每天晚饭后他和警卫员景希珍准时出门，彭戴着大口罩，一边走一边看大字报，有时候还要伸手抢漫天飞舞的传单。行走的路线也很固定，从永兴巷到春熙路，沿东大街、盐市口、人民南路广场再原路返回。可以说彭德怀已经在我们的掌控之中，凭着御封的“左派”名声和当时北地东方红在成都的影响力，没有那个红卫兵组织敢向我们挑战。

就在我们迷惑不解的时候，有消息灵通者报告：彭德怀已被北航红旗的人抓到成都地质学院了。

我们赶紧乘车向位于城东北郊的成都地质学院进发，到了地院天已大亮。车开到一栋教学楼前，听说彭德怀就在二楼的一间教室里。楼里挤满了人，大家都想看看大名鼎鼎的元帅。我好不容易挤到二楼楼梯口就再也无法前进了，楼道里乱哄哄的，人们议论纷纷，但是没有人喊“揪出”“打倒”“炮轰”“火烧”之类的口号，实际上大多数人的心情是好奇，对彭德怀个人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仇恨。下一步怎么办？把彭德怀关在寒冷的大教室显然不合适，北地东方红的人主张把他拉到地质局去，那里是我们的地盘。又听说王大宾、胡乐成正在和北航红旗的人谈判……

不知什么时候嘈杂的楼道突然安静下来。有人说彭德怀出来了，我的视线扫过去，看见一间教室的门被打开，楼道里的人群开始向两边闪开，谭保华等人先从教室里出来，我一眼就认出紧跟其后的是彭德怀。此前没有亲眼见过，但是他身着元帅服的照片给我留下过深刻的印象。彭德怀是方脸，厚厚的嘴唇憨厚而耿直，下塌的眼角略带疲惫，身着黑色呢子大衣，个头没有

我想像的高大，神情平静。我特别注意到，他的脸上也没有那个年代常见的被红卫兵抓住时的惊恐状。我曾经见过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被四川红卫兵抓住时的情景，“李政委”（李井泉同时担任成都军区政委，他喜欢亲信称他“李政委”，就像蒋某人喜欢黄埔生称他为“校长”一样）满头白发，两眼通红，举步维艰，背驼成弯弓，下垂的双臂筛糠般抖动，脸上写满恐惧，往日的霸气早已飞到九霄云外，打小报告的精明也无影无踪。可这位为民请命心中无愧的彭大将军不一样，腰板挺直，面无惧色，气度不凡。他，毕竟是统帅过百万大军身经百战的元帅。

我们将彭总带到大楼外，送进早已准备好的一辆华沙牌轿车。轿车前有一辆宣传车开道、轿车后紧跟几辆装满人的卡车，浩浩荡荡向四川省地质局进发。车到成都地质学院大门时，遇到一小群不明身份的学生的阻拦，估计是北航红旗的支持者。他们人数太少势单力薄，抵不住我们的冲击，很快让出了通道。不久，队伍安全到达了地质局。

北航的韩爱晶低估了揪彭的难度，他只派出了区区五个人就想把彭德怀抓回北京。这五人到了成都，人生地不熟，两眼一抹黑，以为抓彭德怀很简单，五个对一个带上飞机了事。韩爱晶也不知道，同一项任务又派给了北地东方红，中央文革坐山观虎斗。相比较王大宾安排更周密，我们集中了北地东方红在四川的所有力量来完成抓彭任务。王大宾一面和北航的领头人谈判，一面又派人在成都地院寻找彭的下落。谭保华首先发现彭关在教室里，紧跟着我们的大部队就赶到，将该教学楼围了个水泄不通，北航的几个人那里守得住。只有将彭拱手交出。此时，王大宾和胡乐成与北航红旗的人正在另一个神秘的地方进行艰难的谈判，有人悄悄地向他们报告大功告成：彭已被转移到地质局了。王、胡大喜，不再与北航红旗的人纠缠了，起身不辞而别。

彭德怀被我们转移到省地质局二楼的一间办公室，这里曾是地质局某局长的办公兼休息的套间。彭住里屋，学生住外屋，每间房的面积大约20平方。里屋有床和沙发，外屋的地上铺干稻草代床。四川的冬天潮湿而寒冷，地质局机关车队队长徐彬还专门给彭德怀住的屋子端来了火盆。考虑到彭是上了岁数的老年人，不能吃大锅饭，专门给他开小灶。彭德怀到地质局机关后，成都军区就派部队守卫，一般人是不能进办公楼的。

◇ 元帅和红卫兵坦诚交谈

12月24日上午，我挤进了那间办公室的外屋。大家席地而坐，围着彭德怀向他提各种问题，气氛轻松，没有什么人跳出来采取“革命行动”。

我好奇地问他多大年纪，彭德怀用浓重的湖南口音说：“今年楼拾八，比李井泉大十一岁。”（湖南音将6念成“楼”，彭德怀1898年生。）

有人问他怕不怕红卫兵，彭德怀说：“我不怕红卫兵，我愿意和红卫兵交朋友。”那个年代的当权派没有不怕红卫兵的，红卫兵被视为洪水猛兽，彭德怀不怕。

他接着说：“红卫兵响应毛主席的号召闹革命，大方向是正确的，但是你们也有缺点，不注意团结人，打击面过宽。当年在井冈山的红军也犯过打击面过宽的错误，红军曾经把中农当作革命的对象，烧过他们的房子。”

我愕然，这可是第一次听说。井冈山是我们心中的革命圣地，红军一贯纪律严明，居然还烧中农的房子！

还有人问他为什么要上街看大字报、捡传单。

他说：“‘五。一六通知’后，西南局停了我的文件阅读权，只有从街上的大字报和传单中了解运动情况。”令人惊讶的是彭德怀分析街头信息的深度，虽然他看不到中央文件，但能准确地指出运动的矛头是对准刘少奇的。

说到文革，话匣子打开，有同学说：“我们的邻居北京钢铁学院院长高芸生经不起工作队的批斗跳楼了。地院同学怕我们院长高元贵出事，不少同学给他鼓劲：地院的大多数师生都是信任你的，千万不要出钢铁学院高芸生的事……”彭德怀听了说：“五九年庐山会议后，我向毛主席作了三条保证，其中一条是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自杀的，要相信人民，相信群众。”

当有同学说到地院党委副书记周某某生活作风不正派，搞婚外恋，文革开始后，这些事揭发出来，大家叫他“周八戒”。彭总听了后尖锐地批评了某些干部的恶劣作风。话题又扯到“猪八戒”身上，彭德怀说：“‘猪八戒’是天蓬元帅，还有点本事，除妖降魔是有功的，缺点嘛，好色！一见漂亮的妖精就迈不开步了。在信仰上不坚定，一遇到困难就发牢骚，想分东西回他老婆的高老庄，还有点小私心，大耳朵里攒私房钱……”彭总幽默风趣的话，把大家都逗乐了。

王大宾和他说得最多，王大宾的老家在攀枝花铁矿的附近，彭德怀去视察过攀西地区，对那里的发展很感兴趣。

当探工系的同学说到地质部派的工作队打击一大片，以高元贵身为地质学院院长三年不进地质部的门为由罢了他的官，长工出身的院党常委、保卫处长李贵去中南海上书，6月20日学生在学院内游行支持李贵，彭总插话：“看来李贵同志和我一样都是大老粗。”

我们也向彭德怀提庐山会议的事，他只是反复强调他不反对毛主席。他说：“毛主席的话不能说100%正确，也是99%是正确的。”

现在看来，在大庭广众之下要回答这样高度敏感的问题确有难度，他不愿意重复自己的观点，这会遭到红卫兵的反击；他也不愿意承认自己是错的，因为他没错。只有一条可以强调，写那封给他带来灾难的信的初衷不是反对毛主席。

后来，有人又问朝鲜战争的事，听说他搞大国沙文主义，不能平等对待金日成。彭德怀说：“志愿军和金日成的关系很好，完全平等，不存在大国沙文主义。双方也有些分歧，例如志愿军的后勤调度权掌握在谁手里，金日成主张火车一过鸭绿江调度权归朝鲜，我们主张过了鸭绿江也要归志愿军统一调度，分段调度会贻误战机，给志愿军的补给造成困难。”后来金日成也同意了彭的意见。实际上，我听了彭的解释就觉得有道理，这是战争的规律决定的，那里是什么大国沙文主义嘛。

彭德怀还说：“第三次战役结束后，志愿军已经连续作战了三个多月，非常疲惫。后勤补给很困难，前线战士吃不上饭，伤员送不下来，弹药接济不上，急需休整。我请示毛主席要求休整三个月，毛主席同意。但是，金日成和苏联顾问非常不满。说世界上哪有打胜仗的军队不追击敌人的，他们主张趁热打铁。我坚决不同意。后来，毛主席提出志愿军守在汉江以北，金日成带他的部队打到南方去。”金日成也不是傻瓜，孤军深入的事干不得，最后被迫同意彭德怀的意见。

很遗憾当时没有详细记录，由于年代久远，他还讲过很多话都记不清了。我们还向他提过一些有关军内各山头派系的问题，就这样漫无边际地闲谈，突出的印象是：彭德怀的记忆力极好。近七十岁的老人对往事发生的时间、地点、事情的来龙去脉说得清清楚楚。

彭德怀生活朴素作风廉洁是有名的。1959年庐山会议将他打成“反党集团头子”，除了“政治上反动”的材料外，拿着显微镜也找不到腐化堕落的事，于是给他扣了一顶帽子——“伪君子”。对他的生活习惯我们也充满好奇，当天吃晚饭的时候，我在地质局机关食堂遇到一个穿便服的人，见他端了一碗清汤面正往办公楼走，他说彭总胃不好，平常就吃碗面条，生活很简单，彭德怀生活艰苦朴素的美名果然名不虚传。

◇ 揪彭专列进京

回北京的专列定于12月25日下午从成都火车站出发。专列是挂在去北京的34次快车尾部的一节软卧，供彭德怀和护送的部队乘坐，软卧前面又挂了两节车厢供地院师生乘坐。为了确保安全，出发前谭保华去火车站派出所，称：有首长去北京，请准时打开首长专用通道。首长的车到时按三声喇叭，请派出所所长亲自打开大门。

考虑到车过秦岭气温骤降，开车前谭保华还专门试了暖气，发现暖气管没有接通，立即要求铁路局派工人修复才出发。

成都军区用专车，在带队的谷参谋长和一个排战士的护送下，直接将彭总送进专列车厢。

有一个人不想上车，他，就是王大宾。我听见他给军区带队的谷参谋长说：“彭总就交给你了，你保护他回京，我的任务完成了。我要回家看老母亲。”谷参谋长坚持要王大宾一同回京，说：“总理知道你在成都，我们还是一起护送彭总回北京，地院的学生都听你的。”谷参谋长已经知道胡乐成骂王大宾右倾的事，怕没有王大宾在路上管不住那帮人。王大宾心里明白，真要出个什么事，他也不好向总理交代，于是在谷参谋长的再三劝说下，很不情愿地上了专列。

那时中央已经下令停止串联。我也很想挤进专列，虽然红卫兵坐车不要钱，但是坐专列的滋味一定更好。可惜车厢里人满为患，我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也挤不进去，坐专列的美梦只好作罢。

后来，王大宾告诉我一路上护送彭总回北京的情况：火车走了两天两夜，一路上学生们对彭总很照顾，只要路过大站就有人下车去给彭总买好吃的，北地东方红到四川演出的宣传队也乘这趟车回京，他们主动提出给彭总表演节目，大家和彭总在车上相处和谐。

12月27日下午5点专列到北京站。此时，北京卫戍区副司令李钟奇已经站在车站的月台上，他出示了一个卫戍区的大信封，上面写着：谷万才、王大宾同志收。王大宾打开信给谷看：“奉总理指示，把反党分子彭德怀交卫戍区副司令李中奇同志……”。谷和王按照总理指示，正要把彭德怀交给卫戍区时，朱成昭赶到站台，不同意将彭交卫戍区，要将彭带到地院。谷和王坚持要按总理指示办，朱看了总理的指示说：李钟奇的“钟”字写成了“中”，双方争执不下。李和朱都向上面打了电话，后来戚本禹决定：为了不影响北京站的正常运行，火车开到西直门火车站。北地的几辆大客车接学生回校，小轿车送彭到北地。到地院时已经是晚上11点了，大食堂给彭总作了一碗鸡蛋面，在北地办公楼的一个套间（外面有沙发，里面有床铺）安排彭总休息。过了3个小时，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把彭总接走。

27日晚回到地院后，王大宾见了朱成昭很不高兴。王大宾叫钱辛当面将成都带来的一个皮箱和清单交给朱成昭，里面有彭总写给中央的申诉信，要求他转交中央。

◇ 朱成昭与王大宾

朱成昭，北京地质学院水文与工程地质系三年级学生，当时是北地东方红的一把手，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的发起人和主要领导人。朱的父亲是新四军烈士，养父是他父亲的战友，时任上海市建工总局局长。此人性格刚烈，吃软不吃硬。在揪彭问题上开始很强硬，王大宾在成都决定暂不揪彭并打电话通知他时，他在电话里把王大宾大大地指责了一番，随后，派出钦差大臣胡乐成强行揪彭。在北京站和李钟奇对着干，不把彭带回地院誓不罢休。王大宾把彭总的申诉材料交给他请他转交中央，他看了材料后的第三天，态度发生戏剧性转变，他向王大宾表示：你是对的！显然是彭总的材料改变了他。

其实，1966年底，文革正在如火如荼的燃烧时，朱成昭的态度已经悄悄地发生了改变。对他影响最大的是叶剑英的女儿叶向真，他们私下里议论中央文革极左，对打倒老干部不满。后来，发展成反对文化大革命的八大观点。江青和戚本禹曾警告他，要他“悬崖勒马”。可是他绝不认错，朱和叶向真双双跑到广州，准备从香港出国。1967年3月4日北地东方红的一把手换成王大宾。朱成昭后来被抓进监狱关到文革结束。

王大宾，北京地质学院探矿工程系五年级学生，当时是北地东方红二把手。王大宾性格温和，善于倾听不同意见，各派人马都愿意和他打交道。在揪彭过程中，他主持正义反对揪彭。1966年12月27日把彭总接到地院后，他就再也没有见过彭总，也没有参与过任何批斗彭总的策划或活动。1970年全国清查“516”时，王大宾成了“516”分子，其中一条罪状是反对揪斗“反党分子”彭德怀；1981年，王大宾作被审，其中的第一条罪状是揪斗无产阶级革命家彭德怀。真是欲加之罪，翻手为云，覆手为雨。

1967年4月2日，王大宾担任北京地质学院革委会主任。他已经对文革表示出厌倦，多次向北京市革委会打报告，表示担任北地革委会主任室是服从上级的安排，条件是不影响他的毕业分配，他愿意分配到大西南或大西北的广阔天地从事地质工作。

朱成昭已经去世。王大宾健在，王大宾创办的都江堰市探矿机械厂生产红火，他已经把厂交给儿子，自己安度晚年。

◇ 批斗会上再见彭总

再见到彭总已是半年后。

1967年7月15日，中央文革在中宣部礼堂召开首都大专院校和中央各单位负责人参加的“立即掀起对刘少奇一小撮大批判新高潮动员会”，同时下发了有关中央文件，点了刘少奇等人的名。彭德怀自然又成了“刘少奇一小撮”。

7月18日，地院革委会副主任聂树人到小汤山医院看望王大宾。聂向王大宾传达了中央文革办公室给地院革委会的电话指示：“你们地院要和北航联合批斗彭德怀。批斗要注意政策，要文斗，不要武斗。不要邀请军队院校参加，批斗时向卫戍区傅司令员联系要人。天地两派要联合。”聂树人还说：“有关批判材料，中央文革已派人送到地院。看了材料后，革委会常委和政治部、东方红报的人都反映强烈，有人公开说彭德怀被整是冤枉的，地院这么多人同情彭，怎么批？”

王大宾的意见是：“只能应付一下。去年12月我就反对揪彭，这次再不参与，中央文革会老账新账一起算。你们商量怎样应付，不要叫人抓住把柄。”

7月的北京，骄阳似火。比天气更热的是人们的头脑，武斗像瘟疫已传遍全国。此时在武汉发生了震惊全国的“七二〇”事件。已是“死老虎”的彭德怀又成了“军内一小撮”的总代表，报纸大造舆论，掀起“批彭高潮”。

7月25日，地院大字报区的墙上贴出一张海报：7月26日在北京航空学院大操场批斗“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德怀、张闻天”。

7月26日下午，我怀着再见彭总的心情来到北航。

北航的操场人头攒动，打着红旗的各路人马在飞扬的尘土中鱼贯而入，操场的草坪已被踏成癞子的脑袋。记不清几点批斗大会开场了，只听喇叭里传出一声高喊：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德怀、张闻天揪出来！这时，人群像潮水般向主席台涌去，我被裹挟其中随波逐流。终于，被挤到主席台前，可以清楚地看见被批斗者的面目了。彭和张挂着牌子，各被两名大汉架成“喷气式”，彭头上仅剩的几根白发在阳光下闪着银光，下垂的脸皮布满老年斑，神情委顿，与在成都初次见面相比判若两人。7月18日，在北航召开过批彭小会，会上彭德怀已遭到毒打，肋骨被打断。此后，彭德怀在批斗会上必被打。在打人者长长的队伍中还有一位显赫的将军：北京卫戍区副司令李钟奇。李钟奇受周恩来之命护送彭德怀到批斗会场，本应维护彭德怀的安全。周总理智者千虑却有一失，他没有想到李钟奇是假公济私的小人。1958年中央召开军委扩大会议批“教条主义”，军委训练总监部被批为“教条主义大本营”（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前，军委下属五部：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训练总监部、总干部部）。叶剑英时任训练总监部部长，李钟奇是该部下属的计划与监察部副部长，他在会上遭到彭德怀痛批，会后被贬。李钟奇将军记得古训：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不到十年，彭德怀终于落入李钟奇手中了，这千载难逢的报复机遇哪有不用之理。

批斗会在密锣紧鼓地进行，发言者个个慷慨激昂。押在台上的老人已风烛残年，他，曾经是统帅百万大军的元帅，被伟大领袖诗赞：“谁敢横枪勒马”的彭大将军。心中的反差如此强烈，台上的激愤已引不起我的共鸣……我悄悄地退出会场，那闪着银光的白发永远定格在我的记忆中。

几天后，在地院的大字报区遇见王大宾，他告诉我，聂树人已向他汇报了7月26日批斗彭德怀的情况。聂树人说：他妈的！北航学生把彭德怀打成重伤了，违背了中央文革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指示。地院革委会为了应付，只从物探系分会派了少部分学生去会场，我们地院革委会，各系分会的头头都没有去。

王大宾还说：打伤彭总这么严重的事，我要聂树入立即向中央和总理报告，太没有人性了，批判就批判，为什么打人。

□ 作者投稿

~~~~~

#### 【史实辨析】

为地质学院造反派说几句话  
——对《在〈文汇报〉北办的经历》的一些意见

• 阎长贵 •

《炎黄春秋》今年第4期发表的《在〈文汇报〉北办的经历》，是朱维铮先生的口述，由金

光耀先生采访整理。看到这篇文章感到很亲切。金光耀先生是历史学家，还钟情于文革史研究，我很敬重。我和朱维铮先生也有过交往，1982年，我（时任《红旗》杂志编辑）到复旦大学组稿，曾在他家和他晤谈，很投机，他还送我他著的书。

朱维铮先生这篇口述，是研究文革史的一份重要史料，但他关于北京地质学院造反派情况的回忆，即他说：他1967年“4月下旬到北京”，这时，“地质学院的地派作为极‘左’的组织被搞掉了”。我认为，不符合事实。

说地质学院的造反派（其名称：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简称：“地院东方红”）“左”，没问题，所有造反派都“左”，而在所说的北京五大高校中唯独对地质学院造反派冠以极“左”的组织，其道理安在？“地院东方红”无疑也做过错事，如批斗地质部、地质学院的所谓走资派，降低所谓“反动学术权威”的高薪（把有人345元降低到31元，287元降低到67元……），以及参加社会上的一些造反活动等，掌权后也有压制和听不得不同意见的情况等，有很多经验教训需要记取，也需要道歉和忏悔。但整个说来，或从总体上说来，“地院东方红”在运动中是比较注意政策和分寸的。比如，中央文革（戚本禹通过我）最先是布置他们到四川揪彭德怀的，当时他们的头头朱成昭接受任务派王大宾等人去，待接触彭总，和彭总谈话后，他们认为彭不反毛主席，也不反对文化大革命，不应该揪，给中央文革小组写了报告，戚本禹看到报告，郑重地跟我说：“你看，叫他们去揪彭德怀，他们却被彭德怀征服了。”——在整个揪斗彭德怀的过程中，彭总认为地质学院的造反派从始至终对他都是比较好的。彭德怀传记组编写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出版的《彭德怀全传》讲到“文革”中批斗彭德怀有好多学校和单位，但没讲到地质学院。看到此说法，我问地质学院造反派的一个头头，这是怎么回事？他回答说：“当时我们地质学院没有轮到呀！可能上面也不信任……”，这也是地院造反派对彭总态度比较好的一个证明。——也正因为这样，戚本禹又叫韩爱晶派人去揪彭德怀……

实际情况，“地院东方红”在1967年4月下旬以后，恰恰不是“被搞掉”。第一任头头朱成昭，从1966年12月开始逐渐不满意中央文革的思想和行为，比如对逮捕“联动”分子镇压“联动”不赞成，认为中央文革运动群众，说陶铸是被抛出来的等等，受到陈伯达的严厉批评，在领导地院的运动方面发生了一些困难，原来头目之一的王大宾取而代之，成为“地院东方红”的第一把手，1967年4月3日成立了院革委会，“地院东方红”依然活跃，在北京高校乃至全国，有很大影响力。

1966—1967年，我作为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1966年12月改为“办事组”）的工作人员，和“地院东方红”是联系比较多的，不论和他们的第一任头头朱成昭，还是和继起的王大宾，都很熟，关系不错。我觉得“地院东方红”有这样几个特点：

第一，地院造反派是保院主要领导的，即造反一开始就保院长（高元贵，一二·九运动中中国大学的主要领导人之一，行政八级，他担任院长是受师生欢迎的）。工作组一进校，就把矛头对准院长和一大批中层领导，一些学生、干部和教师不同意这种做法，给工作组提意见，被整，就起来造反了。这在北京高校中，乃至在全国高校中，也是不多见的。

第二，“地院东方红”，本来也是少数派，但时间不长就一统天下了——不少党政干部和教师也都参加了“地院东方红”，在地院没有出现与之对立和抗衡的另一个全院性的造反派组织。当然，在“地院东方红”内部也有小的派别。

第三，地质学院的造反派不仅保护了本院的一些领导和教师，还保护了院外的一些人。关于这个问题，可举《炎黄春秋》2004年第1期所发李锐《从一个案情看一段痛史——〈回忆四川肖李廖案件〉序言》中谈到的一个情况。李锐在这篇序言中有一段关于地质学院造反派

的话，很值得注意。他说（黑体为笔者所加）：

作者在记述“文革”时期颠沛流离的经过中，记下在北京地质学院接待站的经历，我以为是一份很有意义的记录。通常，人们一说起红卫兵、造反派、专案组时，总是很反感的。可是伯康在这里遇到的一些大学生，仍有着年轻人的热情和正义感，听了伯康的说明之后，就尽力帮助他们，想为他们讨还公道。尽管当时完全没有可能解决这样的冤案，但是这些大学生所做的努力，是令人感动的。这也使我们看到，即使在暗无天日的十年浩劫之中，仍有一些正直的人想尽自己的微薄之力做一些好事。伯康说：“我们和这些青年学生相处一年多，在那动乱的年月，没有发现他们有什么过火越轨的行为。他们不辞艰辛，不畏风险，踏踏实实，认真真地做了不少调查工作，无非是为了弄清我们问题的真相，辨明是非曲直，伸张正义。他们没有个人功利目的，动机是纯正的，为人是正直的。他们在我们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就写出了社会生活的复杂性；这就可以增强对国人人性的信心，对我们民族未来的信心。

关于这件事，我问过王大宾本人。他告诉我：我们确实保护过外单位的一些人，我们专辟一个楼做这件事情，除了四川的肖（肖泽宽，重庆市委组织部部长）、李（李止舟，重庆市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廖（廖伯康，重庆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兼团市委书记）以外，我们还保护过其他一些干部（包括邓小平的弟弟武汉市副市长邓垦、重庆市委的刘隆华和吴海如等）和一些著名人士（如京剧表演艺术家、第一个演阿庆嫂的赵燕侠，歌唱名演员郭兰英，大导演崔嵬等），大概共有40多人，当时没人敢到地院揪人。对地质部部长、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我们专门发了保护声明，此事受到周总理表扬，说我们：“做得好！”王大宾说：保护干部和名人，这是周总理交给我们的任务，副总理李先念直接给我们学校拨专款——拨款最后没用完还交上去了。不管什么原因，这在文革中说来，都是一件好事——大好事！

我说了地质学院造反派的几个特点，不知是否符合实际，还请原来地质学院的同志和了解情况的其他人指正。一句话，我认为，不论对造反派，还是对文革中的任何一件事情，都要把事实搞准确，并且注意人和事的复杂性，坚持分析的态度，千万不能和不要“一锅煮”，用一个名词和概念掩盖和混淆事物的真相。

□ 摘自《炎黄春秋》2013年第八期

~~~~~

【史海钩沉】

师道之殇：陈毅之子为文革道歉的史实背景

• 谌旭彬 •

8月20日，陈毅之子陈小鲁一封反思文革的道歉信引发了网络热议。今人对道歉信中所言及的文革时针对教师的暴力行为，虽已相当熟悉，但却未必了解其前因后果。本期专题，拟就此作一点介绍。

◇ 1966年夏天，教师群体遭遇第一次暴力高峰

提到文革针对教师群体的暴力，大多数人会想到1966年夏天。这年夏天，“大规模迫害同学和打老师的事件同时发生，并从北京蔓延到全国”，文革研究者王友琴说：“据现有资料，我们还没有找到一所学校是没有发生打老师也没有迫害‘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的”。为什么大规模的暴力行为会在1966年夏天降临到千千万万的教师们头上？

◇ 文革初期对教师的暴力迫害，与“老红卫兵”把文革当成反右搞有很大关系

尽管毛泽东早在1965年1月就曾有过内部批示：“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但直到文革爆发，绝大多数人仍不了解这场运动的真实指向。不但普通人不了解，中央领导层乃至大多数地方省、市领导，也不了解，以至于刘少奇在1966年7月29日北京市委召开全市大中学校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上公开表示：“至于怎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我革命怎么革，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我想中央的其他领导人也不知道。”曾任吉林省委第一书记的吴德也回忆：“当时，大家都很紧张，我更是摸不着头脑。……‘文化大革命’前夕，对‘文化大革命’的起因不了解，对中央存在的党内斗争更是毫无所知。”这种“摸不着头脑”，使大多数人误以为文革将继续沿袭之前的反右传统，仍以“地富反坏右”为主要斗争对象。

在这样一种认知下，最早兴起的以高干子弟为主体的“老红卫兵”和各地省市由党组织出面创设的“官办红卫兵”，迅速将他们斗争的矛头指向了各自所在学校的教师群体。这些“老红卫兵”和“官办红卫兵”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自己对教师群体的批斗是“正确”的，因为就在1966年5月7日，毛泽东在一封给林彪的信中明确写道：“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1966年北京“恐怖的红八月”，许多教师倒在了红卫兵的皮带之下，正是这样一种“反右传统”的结果——1966年9月份之前，北京基本上是“老红卫兵”和“官办红卫兵”的天下，“造反派红卫兵”直到周恩来、陈伯达代表中央亲赴清华大学为蒯大富等人平反后，才在9月份渐成气候，随之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与“老红卫兵”和“官办红卫兵”展开激斗。在此之前，北京各大专院校的学校领导、工作组及校文革都普遍认为：文革就是反右的翻版。故而相当积极地或明或暗地把校内的教师、学生按之前反右运动的逻辑和标准，划左、中、右，进行隔离审查乃至暴力批斗。8月份毛泽东“炮打司令部”后，95%的各校工作组被认定犯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局势才开始逆转，之前被“老红卫兵”和“官办红卫兵”压制、打击成“右派”的“造反派红卫兵”得以翻身。但教师群体的境遇并未因此好转。

对文革初衷认知错位，把文革当成反右来搞，并不仅限于北京。以宁夏为例，6月4日，自治区党委按照刘少奇的指令，派出工作组进驻银川各校领导文革，即按反右运动的逻辑，将运动矛头指向了教师和基层干部。6、7月间，以宁夏大学为例，83%的老师遭到了大字报批判，42%的教师被划为坏份子遭到批斗，许多出身非红五类家庭的学生，也成了工作组重点斗争的对象。直到10月份，以这些受打压的非红五类学生为骨干的“造反派红卫兵”，才在北京中央文革的支持下，占据上风，将运动的斗争矛头重新定位为“官僚主义者阶级”，即所谓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 文革初期教师群体所受暴力缺乏统计数据，但可参考“反右运动”中教师的遭遇

文革初期发生在北京各大院校针对教师群体的种种暴力，已有相当多的资料披露，此不赘述。尽管在此一期间所发生的惨剧并没有也不太可能有详细的数据统计，但这些惨剧既然以“反右”的逻辑进行，则不妨参考一下反右运动期间教师群体的遭遇。

据中山大学李若建教授统计披露，“一般认为，右派是知识分子，这并没有错，但是右派是哪一类知识分子，却少有人注意。根据大量的地方志和地方文献记载，半数左右的右派是中小学校教师。1957—1958年河南省有7万人被打成右派，其中教师4.1万人，占58%，是笔者所见到省级右派职业构成中，教师比重最高的。在河南省内部，一些地区右派中教师的比重更加高。55万多名右派当中，绝大多数并非著名人士，而是受过一点教育的普通人。……

过去受到关注的往往是工作生活在大城市的右派，其实绝大多数右派工作生活在小城市和乡村。而且越是基层，右派的比重越高。……笔者估计在右派分子中间，大约40～50%是中小学教师，另外20～30%左右是县级以下基层干部，还有5%左右是大中专学校的学生。也就是说，这些小人物构成右派分子的70～80%，甚至更多一些。”（李若建：《庶民右派：基层反右运动的社会学解读》，《开放时代》（广东）2008年第4期）

上述数据提醒我们，按50年代反右运动的逻辑，1、教师群体在“右派分子”中占据着绝对的数量优势，是整个反右运动中受灾最惨重的群体；2、这一群体内部，受灾最惨重的是基层中小学教师，但后世对反右运动关注的焦点，往往集中在一些著名知识分子或著名大学教授身上，有意无意地遮蔽了历史的真相。文革初期对教师群体的斗争，既然沿袭了反右的逻辑，大约也应该具备上述两项特征。

◇ “造反派红卫兵”亦曾参与迫害，其上台并未改变教师群体的境遇

诚然，许多“造反派红卫兵”骨干因出身并非“自来红”，曾和教师群体一起，被“老红卫兵”和“官办红卫兵”打入“右派”另册。但这并不意味着“造反派红卫兵”压倒“老红卫兵”和“官办红卫兵”后，教师群体的境遇能够得到改善。譬如，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造反派”组织“井冈山”，在和“老红卫兵”隔楼对垒时，即曾用布蒙住两位校长和三位老师的眼睛，将五人驱赶到四层楼顶，用皮鞋底抽打。如此做的原因，是对面楼上的“老红卫兵”骂他们“保守”，故而欲以此来证明自己“革命”的彻底程度。

当然，一者，“造反派红卫兵”的主要斗争对象是“走资产阶级道路的当权派”，故而多在社会上活动，对校内的“地富反坏右”关注度有限，1966年夏天那种对教师群体狂风暴雨式的暴力迫害已经有所缓和。此一过程，正如文革学者王友琴所描述的那般：“1966年7月28日决定从学校撤离‘工作组’，8月5日就有老师被打死。到8月下旬，发展到在北京每天有几百人被打死。9月后每天被打死的人数渐降。”二者，为了区别于“老红卫兵”和“官办红卫兵”，“造反派红卫兵”也曾将部分被打倒的“右派教师”重新树立为“革命教师”，如“首都部分大专院校中等专业学校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编写的《天翻地覆慨而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修订本，北京，1967）1966年6月23日条下，就有这般记载：“仅在二十四所高等院校统计，反革命工作组把一万零二百一十一个革命小将打成‘右派’，把二千五百九十一一个革命教师打成‘反革命’，这2591个被打成右派的教师，又被重新确认为‘革命教师’。但总体上，只要‘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着学校’这一定论不变，无论哪一派红卫兵在校内掌权，教师群体的境遇始终都好不到哪里去。

◇ 1968—1969，第二次暴力高峰来得更猛烈，更有组织有系统

文革期间教师群体所遭遇的暴力，有两次高峰。第一次即前述1966年夏天由“老红卫兵”和“官办红卫兵”为主体掀起的针对教师的集体暴力。第二次迫害高峰始于1968年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更为组织化、系统化，持续时间也更长，但了解者却并不多。

“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缘自高层对文革愈演愈烈的武斗现象的一个基本判断。1967年12月18日，在同阿尔巴尼亚外宾谈话时，毛泽东曾明确指出：“这（武斗）绝不是偶然的事，是尖锐的斗争。解放后包下来的国民党、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国民党特务、反革命——这些就是他们武斗的幕后指挥。”毛泽东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相信武斗是“反动势力”操纵的结果，不好判断。但在1968年，面对武斗失控，毛泽东曾多次发表过类似的讲话。譬如6月21日，在会见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时，毛泽东甚至说出了这样一番话：“过去我们留下了一批表现比较好的国民党人，这是我们的政策。我们没有教授、教师，没有办报的，没有艺术家，也没有会

讲外国话的，只好收罗国民党的一些人或者比较好的一些人。有一些是国民党有计划地隐藏在我们的工厂、政府机关和军队里。……当然不是所有教授、教师、技术人员一个也不好，不是这样，但有一部分很不好。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清理他们，加以清理，好的继续留下来做工作，坏的踢开。”

所谓“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清理他们”，显然并非由衷之言。文革的初衷，是针对“官僚主义者阶级”，并非是为清理“教授、教师、技术人员”。但文革进行到1968年，欲破者已破，欲立者未立，亟需想办法收场，此种论调显然是为收场服务。更早一些时候，1968年5月11日，毛泽东在同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谢富治谈话时，已明确将文革基本性质从“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转换为“共产党和国民党长期斗争的继续”，毛泽东说：“整顿队伍，把坏人抓出来，基本上是对的。自从我说了文化大革命是国共两党战争的继续后，抓了一批国民党坏人。”这种转换，究竟是出于策略（与党内高级干部和解），还是发自肺腑，自可见仁见智（事实上，“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所打击的对象，仍包括大量省部级在职高官，换言之，虽然叫法不同，但“打倒走资派”和“清理阶级队伍”，在内容上仍具有高度的相似性）。但一句“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清理他们”，对教师群体而言，则意味着又将面临一场狂风暴雨般的政治运动。正如《毛泽东传》（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所总结的那样：“他对敌情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又在‘文化大革命’以来异常混乱的无政府状态和极为紧张的政治氛围中，采取‘大民主’的方式，大张旗鼓地发动这场‘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结果，各地到处出现对被怀疑有历史问题或视为有现行反革命行为的人任意扣押批斗侮辱、采取逼供信等现象，导致不少非正常死亡。它波及社会的方方面面，时间虽不长，造成的后果却很严重。”

“清理阶级队伍”运动造成的后果究竟有多严重？可以通过一组数据来体会：据1969年4月统计，安徽全省揪出各类“叛徒”、“特务”、“坏人”43万余人；浙江全省被关押揪斗者10万余人，被逼致死者9198人；山东清理出11.36万各类“叛徒”、“特务”、“坏人”；从1968年5月到10月，吉林挖出“阶级敌人”9万余人……

具体到教师群体，据1980年11月5日高检特别检察厅关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起诉书中的统计，仅教育部所属单位和17个省、市教育界受诬陷、迫害的干部、教师就有142000余人。卫生部直属1所高等医学院校674名教授、副教授中，受诬陷迫害的就有500多人。仅陕西一省，高校中被“立案审查”的教师就达3838人，占1969年全省高校教师总数的53.6%。河南各级各类学校的教师、干部被立案审查的有46000余人，约占全省教职工总数的20%。“文革”期间河南省非正常死亡教授，则占到了全省教授总数的12%。中小学教师也横遭迫害。天津市区中小学教职员被审查的有3756人，占市区中小学教职员总数的33.13%。市内6个区被审查的对象中有35%的人被关进“牛棚”，有23%的人被批斗。四川省中小学干部、教师被“立案审查”者达31193人，其中被迫害致死的有1822人，被开除的有4866人。

再以南京大学为例。该校在江苏文革动乱最剧烈的1966—1967年间，没有人因为遭到群众批斗致死，也没有人在武斗冲突中死亡。但在1968年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据不完全统计，全校共组织学习班9期，组织批斗大会15次，批斗29人，各系自行组织批斗的对象85人，批斗345人次。全校成立285个专案组，办专案队伍达1510人，全校被立案审查对象141人，定案41人。审查中不幸死亡者5人。但因为种种原因，对教师的迫害程度远甚于1966年夏的这场“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反倒有逐渐被人遗忘的趋势。

◇ 高层权力斗争是作为“死老虎”的教师群体屡屡在运动中被波及的一个重要原因

还应该注意到的一点是：自反右运动以来，全国绝大部分大中小学校的教师，实际上已经

是“死老虎”。对现行政治，尤其是教育改革，基本上处于一种失语状态。这样一个沉默的群体，之所以仍屡屡被卷入政治运动，成为被整肃的对象，除了所谓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顶帽子之外，其身为高层权力斗争的一粒棋子，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以南京大学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为例，据董国强教授分析，“清队”不但“是毛泽东收缩群众运动的重要举措”，还为当时执掌江苏大权的许世友“清除各种异己势力提供了便利”，同时还“为南大校内‘多数派’打击、排斥‘少数派’提供了合法性掩护”，正因为三方力量“构成一个三位一体的利益共同体”，“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才得以在南大“轰轰烈烈地开展”。

再如，围绕着对文革爆发前17年教育战线的功过问题，张春桥等人和周恩来也曾有过多次激烈的正面角力，角力的动机当然不在于教育改革本身该怎样搞，而在于：作为文革新贵的张春桥等人，需要通过彻底否定文革前教育战线的成就，来打击周恩来等务实派的政治地位，因为文革前17年的教育工作，正是周恩来等务实派主抓的。这种高层角力的结果，必将直接影响全国所有大中小学教师的人生命运。张春桥坚持认为：文革前17年的教育战线，无产阶级从来没有占领过，“不要说‘彻头彻尾’（没占领过），说百分之九十九（没占领过）好不好！”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一开始，上海代表即发难称：文革前17年教育战线，是“叛徒、特务、走资派把持领导权”，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周恩来则强调：“毛主席的红线也是照耀了教育战线的”，“知识分子的大多数是接受共产党领导的，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张春桥则反称“名义上是共产党领导，实际上是假的。”这场角力最终以张春桥一派获胜告终，会后刊布的《教育工作会议纪要》宣称：1949年至1966年的17年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原有教师队伍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如此，张春桥所谓的现在的教师队伍“要大换一批。对这些人我恨恼火，可都枪毙也不行啊”的论调，也就有了政策支持，教师群体的境遇，再次雪上加霜。其他如黄帅事件、考教授事件、白卷事件，无一不与高层权力斗争交织在一起，无一不对教师群体的境遇影响甚深。

◇ 结语

反思历史，忏悔历史，不但要知其然，还须知其所以然。文革期间教师群体所遭受的苦难，已为世人所熟知，是可谓“知其然”；但这些苦难的具体发生逻辑，却至今迷雾重重，仍“不知其所以然”，专题所述，不过是其中的冰山一角。

□ 原载《腾讯历史频道》

~~~~~

【劫后反思】

良知的拷问（选载之十一）

• 孙怒涛 •

（上接 z k 1 3 0 9 a，第七章 4 1 4 的外战和内斗（1967. 6—1968. 9））

第九节 两派争斗的三个关键词：思潮、权力、利益

在此我对清华两派产生的成因和争斗的实质做一个比较简洁的表达：

团四两派的争斗，基本上是两个不同的利益群体（新优质群体与原优质群体），成立各自的政治组织（兵团总部和414总部），为了维护各自群体的利益，提出各自的政治观点（“红线



主导”论和“彻底砸烂”论），形成各自的思潮（团派思潮和四一四思潮），目标是为争夺清华文革领导权和革委会政权权力的一场斗争。

这里有三个关键词：思潮、权力、利益。

思潮是派战的大旗，权力是派战的目标，利益是派战的目的。

思潮，即思想潮流。每派中，为大多数人所接受的主流观点的集合形成思潮。4 1 4 思潮的核心观点是“红线主导”论，团派思潮的核心观点是“彻底砸烂”论。两者阐述充分，表达清晰，泾渭分明，发挥到极致。

两派为了表白自己的高尚，都一再强调清华两派之争是思潮之争，路线之争，不是你争我夺的权力之争，更回避背后的利益之争。但是，否定也好，淡化也好，都改变不了两派争斗的这一实质。

围绕干部问题的大辩论，主要是一场争夺文革领导权的斗争。纵队派与团派各自亮出自己的观点，打出自己的旗帜，以求吸引更多的群众，引领清华文革的方向，并为未来三结合的革委会中争取更多的权力做准备。

到了要联合，要成立革委会的时候，围绕着实实在在的权力分配和今后的权益，两派的争斗进入到白热化的状态，远比争夺相对比较虚的运动领导权要激烈得多。

团派要建立以蒯派为核心的占压倒优势的革委会。对于保守右倾的、原先一直视为非法组织的4 1 4，让到9：4已经是底线了。团派绝对不肯退让到与4 1 4平分秋色的对等。

4 1 4对权力的渴望在这个时候同样是毫不掩饰的。对于9：4，4 1 4并不是很满足的。4 1 4力争的是对等。4 1 4容不得在革委会里团派占有压倒多数的权力。《四项协议中》中没有加“正确”两个字给了4 1 4一个撕毁协议的借口。最根本的是，即使鱼死网破，4 1 4也要阻止由团派主宰的革委会成立。

蒯大富必须争权。如果说，蒯大富在工作组刚进校的时候写在大字报上有关权的那段批语，还没深刻领会权意味着什么的话，被工作组整成反革命以后的蒯大富，是真正了解了权就是生存的命根子。蒯大富这个人有私权的欲望，但他主要的、更多的是为新优质群体而争权、而掌权。蒯大富反唐、反“八八”，表面上看起来是观点之争，本质上是不愿让“八八”分享权力，只想要“井冈山”（蒯派）大权独揽。蒯大富要权的口号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应该当仁不让地争权。

沈如槐也必须争权。纵队派被迫解散，4 1 4处处受压，这些都教育了沈如槐没有权是多么的痛苦。对权的渴望，为权而争夺，沈如槐一点也不逊于蒯大富。沈如槐也并不是为个人而争权，他完全是为原优质群体的翻身而争权。沈如槐要权的口号是要让更加正确地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4 1 4掌权。

连向来对权迷迷糊糊耻于谈权的我，此时似乎也清醒了不少，大谈权的问题。4月18日，“孙怒涛贴出《两大政治派别斗争实质的探讨兼评“权”》”。文中提出“左派分化论”，指出当前左派内部斗争的实质是“由谁来掌握领导权”的问题。

在权力的背后，最根本最核心的是什么？那就是利益。谁掌权，或者说，谁在权力机构中获得多数或绝大多数，谁就争得话语权、决策权，它所代表的群体利益就能得到保障。

关于利益，现在有两种观点各执一词。不少文革的亲历者都否认自己积极参加文革有私利的考虑。都认为自己一心跟着伟大领袖闹革命，只是，文革错了，自己受骗上当了，但是参加文革的动机是纯洁的、高尚的、无私的。而在不少没有参加过文革的后人们看来，参加文革的人都是为利而去。文革中的种种因果，都是利益的驱动所致。

我认为这两种说法都是带片面性的。实际情况是，绝大多数参加文革的人，既非全是动机纯正思想高尚的无权欲无私利的“完美主义者”，也非都是利欲熏心追名逐权之徒。对绝大多数人而言，他们确实都有很高昂的革命热情，为革命事业的献身精神以及相当纯洁的革命动机，同时也有在革命外衣包裹下的强烈的政治利益诉求。

文革年代的利益，主要不是经济上的利益，而是政治上的利益。那个年代的人，对金钱，对物质利益，远没有像现在的人们那么看重。在文革年代，甚至可以说从建国以来到改革开放前，普通人对政治利益是极其看重的。

有谁愿意成为右派？有谁不愿意成为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右派的命运就是没有尊严、没有地位的贱民，就是贫病交困、难以自保的社会弃儿。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前途就是得到党的信任和重用、受人尊敬、有好的工作和生活。在从优质群体中的佼佼者到差质群体中的落魄者的多个阶梯中，绝大多数人都有想通过文革，通过积极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通过以实际行动向伟大领袖表忠心，达到改善政治处境提升政治位能的目的。所谓“要求进步”，不就是优质的想变得更优质，差质的比以前少一点差质？所谓“害怕掉队”，不就是怕慢慢地或突然地掉到差质群体里，甚至成了右派学生？当我们经常说到“要求进步”、“害怕掉队”的时候，除了为党为国的纯正动机外，就没有一些为已的利益考虑？

我不是说，争取或捍卫个人的（政治）利益是可耻的、见不得人的。我也不是说，参加文革的人都是以此作为最主要原动力的。不少人说自己参加文革纯粹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是因为强烈的关心国家大事民族前途的责任感，是纯真朴素的理想追求和为了捍卫自己的政治观点。他们不承认自己有丝毫的利己动机和利益考虑。我相信，绝大多数人并没有强烈的权力意识，更不是想当什么山大王。我相信，绝大多数人没有经济方面的利益考虑。甚至，我也相信，确实存在一点私利都没有考虑的很纯粹的一些人。但是，我还是要说：对大多数积极参加文革的甚至包括逍遥派的人而言，谁能否认与一生前途命运息息相关的政治利益丝毫都没考虑过？

就说我自己，临毕业前，文革爆发了。才不过几天，反蒋保蒋的惊心动魄，让我们每个人都知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政治运动。我“九评”学习中落下的政治“污点”只有在新的政治运动中才能洗刷清或洗刷得白一些。我积极地投入了运动。那种积极性曾引来根红苗正的优质生的侧目，引来“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的警告。我参加文革，有没有私心？扪心自问，有！我既有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反修防修的纯正动机，内心也有将功补过的愿望。反蒯的时候，没与工作组站在一起，又被迫做检讨。我非常难过，既为自己没有打退蒯大富猖狂进攻的战斗中为党出力而自责，也为又一次犯了错误、前途更加暗淡凶险而恐怖。我写了检讨，总想检讨得好一些，那样在运动后期就会网开一面，避免做右派学生的可悲下场。但是我没有灰心失望。《少数赞》中“什么委屈、误会呀，什么打击、帽子啊，什么前途、命运啊，……都会冒出来。”也“恨不得自己多长十双眼睛十张嘴，十个脑瓜子十条腿，便于多看、多问、多听、多想。他恨不得一天等于四十八小时。”这些都是我那时内心独白和真实写照。我非常想通过积极参加文革，把自己从差质群体中捞出来，回到优质群体中去，回到如高中和大学前几年受信任被依靠的政治状态。说实话，作为一个差质生我感受到无声的蔑视、鄙夷实在太压抑、太难受了。我害怕今后漫长的人生都要在这样的状态中度过。文革给我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翻身

机会。

当总部委员，那完全是偶然，得益于《少数赞》的出名。文革前的差质生当总部委员的，可能就我一个吧？我知道自己不是搞政治的料，也不是做“官”的料。做不做总部委员，当不当革委会副主任，对我来讲真的无所谓。我最在乎的是能不能重新成为一个党所信任的优质生。做革命事业接班人，对我来说就是做个党员，有尊严受信任地做点我喜欢做的技术工作。

团派骂 4 1 4 是“右倾复辟”，本质上没有骂错。这批红旗下长大的优质生，少则已经乖乖地听党的话苦心修行了几年十几年。那些出身于双革家庭的，把上一辈老子的政治积累也算上，足有几十年了。这些原来的优质生才经过短短的半年时间，政治地位一落千丈，掉入到新差质群体。原来铁板钉钉、无人敢抢的接班人位置也被新优质群体（团派）取而代之。他们不甘心沦落，他们努力要再攀爬到优质群体的愿望非常强烈。如果团派一派掌权，4 1 4 中这些过去的优质生今天的差质生，不是能不能做接班人的问题，很可能处境将会进一步恶化。他们不愿意在团派的统治下忍气吞声、苟延残喘。他们是文革前十七年的既得利益者，文革让他们的利益受损。他们拼了命也要阻止团派一派掌权。他们确实有回复（难听一点的说法就是“复辟”）到文革前美好日子的强烈愿望。

4 1 4 骂团派（主要是崩派）是政治暴发户，本质上也是一点没错。这些已经成为反革命或反动学生的崩派，要按照以往的政治运动，最后是要打入到十八层地狱的。可是他们才经过几十天时间就平了反，才不过三四个月就戴上了革命左派的桂冠，接着又掌了权，成了名副其实的革命接班人。连那些老牌的差质生也混迹在团派中成了革命左派，不再低眉顺眼了。在 4 1 4 眼里，这些政治上的暴发户，哪里有什么真正的路线觉悟可言，纯粹是政治投机投对了而已，更别说十七年的阶级觉悟了。这些政治上的暴发户，是文革的既得利益者，他们拼死也要保卫文革带给他们的胜利果实。所以，他们不能再被原先的优质生赶下台重新沦为差质生的愿望非常强烈。如果 4 1 4 一派掌权，崩派就会“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再次沦为差质生。这是团派（崩派）坚决不能容忍的。

本来，优质群体与差质群体是客观存在的。优质群体的利益与差质群体的利益的矛盾也是客观存在的。如果这两个不同的利益群体懂得在维护自己利益的同时还能考虑、照顾到另一方的利益，那么他们在协商、妥协之后，是能够找到一个利益平衡点，获得如现在所说的双赢结果。

遗憾的是，在无产阶级继续革命的理论中，只有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你死我活的斗争，只有一分为二永无止境的斗争哲学。所以，团派的上台必然要让 4 1 4 变成受压的差质群体，4 1 4 的上台必然要让团派重新回到受压的差质群体。代表新优质群体的团派为了保住既得利益而不会让 4 1 4 分享它的既得利益。代表原优质群体的 4 1 4 为了夺回原有的既得利益不能让团派一派掌权。双方不会妥协，也不愿妥协，这两个群体之间的生死恶斗就是不可避免的了。他们宁愿做一场零和游戏同归于尽，也不愿共赢共存、联合相处。

对于文革，有一种“新文革、旧政府”的说法。中央开大会时，在庄严的主席台上，左边坐着清一色的“新文革”，即中央文革中央军委办事组这批左派，右边坐着清一色的“旧政府”，即老师、副总理等。中央也是两个群体。这两个群体绝不混坐，界线分明，形同水火，生死不容。清华的两派、两个群体，就是中央两派、两个群体在基层的反映。他们争斗的激烈和不可调和，本质上是一样的。

第十节 “东方红战团”与“三七战团”，4 1 4 这辆三轮战车的前后轮

4 1 4 总部成立以后，一整套完整的组织体系很快建立起来，从各系建立的分部到总部的各职能机构。因为“4 1 4 串联会”在两个月的发展过程中，组织体系已经初成雏形，4 1 4 独立成总部后，再加以扩充完善，组织体系就比较完整了。

在我决心拉着“三七战团”与“东方红战团”搞4 1 4 独立的时候，根本没想过在4 1 4 总部里与“东方红战团”怎么分配权力的问题。那时头等大事是4 1 4 独立出来以后能不能生存的问题。

革委会的流产标志着4 1 4 总部生存下去已经没有问题。我和汲鹏既没有权力的欲望，也欠缺组织能力。而“东方红战团”做组织工作的人才济济。尤其是宿长忠，做了大量的组织工作。在总部、分部和职能部门，“东方红战团”的人占优，也有相当一部分是不属于两个战团的教师、干部和学生。既然已经是同舟共济了，我又不擅长搞组织工作，所以没去过问分部和职能机构的组建。而沈如槐、宿长忠也是择优选用人才的。

“三七战团”的人数，也就十几个战斗组一百多号人。“东方红战团”有“三纵队”合并而来，估计人数会超过“三七战团”。我不知道他们究竟有多少人，瞎估计可能有二三百人吧。也就是说，在4 1 4 里，绝大多数群众是既不属于“东方红战团”也不属于“三七战团”的。

就团派与4 1 4 派相比较，团派是造反派中的鹰派、强硬派，4 1 4 是造反派中的鸽派、温和派。而在4 1 4 内部，“东方红战团”是4 1 4 里的鹰派，观点比较激进，态度比较强硬。“三七战团”是4 1 4 里的鸽派，观点比较保守，态度比较温和。

“三七战团”与“东方红战团”都认同“红线主导”论，都反对团派的极左思潮。这是4 1 4 的基本观点，也是“三七战团”与“东方红战团”结为同盟的政治基础。但是“三七战团”与“东方红战团”还是有所差别的。

从组织成分上讲，“东方红战团”是由“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演变过来的，他们与“井冈山红卫兵”没什么渊源。“三七战团”是由“天安门纵队”演变而来的，而“天安门纵队”由隶属于三总部的战斗组为促进三总部联合而成立的。“三七战团”里有属于“井冈山”的战斗组（如“第一湘江”），有蒯派（如汲鹏、王允方等）、有我这样担任过“井冈山兵团”总部委员，所以“三七战团”对“井冈山”是有相当感情的。

从政治观点讲，差别主要有两点：

在干部问题上，“三七战团”比“东方红战团”要保守得多。“东方红战团”的胆量与步伐显得更大。沈如槐等在解放干部问题上不断提出一些新观点、新举措。有些观点很有新意，我们很支持的。有一些观点，我们一时也难以接受，于是就保留。还有解放干部的一些举措，如树立吕应中、谭浩强这样的典型，我很支持。但是对刘冰这样的校级“走资派”，虽然我已经了解后知道他是工农干部出身，历史上没问题，但我认为在条件不成熟，超越了4 1 4 大多数群众的接受程度，解放他的步骤操之过早、过急，反而会陷4 1 4 于被动之中。总之，在解放干部的问题上，“东方红战团”无论是在观念上还是在行动上，一直起着冲锋陷阵的带头作用。4 1 4 在解放干部上所取得的成绩，主要应当归功于“东方红战团”。“三七战团”努力紧跟、积极参与、适度牵制。在团派极左的强大压力下，“三七战团”对“东方红战团”在干部问题上的右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周泉缨在《必胜》中说：“你们口中‘极右’的叫声愈高，我们愈是感到还‘右’得不够！等我们解决了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问题，再‘右’个样子给你们看看！”他所说的“你们”，主要是指团派这样的激进造反派，也多少捎带着是对我们说的。对于“东方红战团”为了与团派的极左划清界线而拼命向右的倾向，我们是十分担心的，生怕4 1

4 过于右倾被团派坐实了“右倾复辟”的罪名。

在对团派的态度上，“三七战团”比“东方红战团”要温和得多。“东方红战团”对蒯派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不信任，对蒯派掌权从心眼里不服气。周泉缨“团派上台就是蒋介石上台”这样极端的观点，在“东方红战团”的核心层中居然也有一定的市场。“东方红战团”的大多数头头都是原来的优质生，他们对蒯派这些政治上的暴发户，对原来的差质生似乎有着一一种斜眼瞧人的轻蔑感。团派与4 1 4的对抗，实质上是蒯派与“东方红战团”的对抗。他们之间是互不妥协的。“三七战团”对团派的判断和态度，远没有“东方红战团”那样的严厉和强硬。

正因为有这样两点主要的差别，我，还有“三七战团”，常被个别“东方红战团”的朋友调侃成是“团老四”，意思就是观点和情感都偏向老团的老四。

尽管4 1 4绝大多数群众没有在组织上参加“东方红战团”或者“三七战团”，但是在观点上，不是倾向“东方红战团”就是倾向“三七战团”。一个团体中，中间群众总是占大多数的。4 1 4的大多数中间群众的观点都是偏向“三七战团”的。但是因为“东方红战团”的头头和战斗组，他们的政治能量和影响力都非常大，在4 1 4总部和机构里又占着大多数，所以4 1 4的基本走向是由“东方红战团”决定的。“东方红战团”明白“三七战团”这一同盟军对它的极端重要性，所以，对我与汲鹏一直比较尊重。对于“三七战团”所代表和反映的4 1 4大多数群众的意见也能倾听一部分，并在行动上做适当的调整。

虽然“三七战团”与“东方红战团”之间有分歧、有争论、有时候甚至偶有争吵，但是有一点最基本的共识。大家都明白的，在团派这个外强的巨大压力下，“东方红战团”与“三七战团”已经同坐到4 1 4这条船上。风雨同舟，休戚与共，彼此的政治命运是连结在一起的。共性大于差异。所以4 1 4内部，整体而言是团结的。

4 1 4总部成立以后，我不知道“东方红战团”是怎么运作的。我对“三七战团”过问得更少了，管理工作都是由高季章、王允方他们在负责。尽管有时候会以“三七战团”的名义发表一些声明或者文章，但是活动已经远不如4 1 4总部成立之前了。因为我认为，“三七战团”在观点上与“东方红战团”之间保持一定距离是必要的，但是在组织上，“三七战团”没有必要过多的独立活动，这样对于维护4 1 4内部的团结是有利的。

一个组织的核心层里有不同意见甚至有公开的不同两派，只要处理得当，是利大于弊的。当然，首要的一点是这两派的共同利益要远大于各自代表的利益。其次，占优的这派不能以势压人，要尽可能照顾到少数派的利益诉求。少数派也不能处处发难事事计较，更不能面和心不和，搞阳奉阴违的小动作，应该是起建设作用的少数派。我当时就想过，要是4 1 4全按“三七战团”的去做，肯定就是前怕虎后怕狼似的温吞水一碗，永远不会有大的作为。要是全按“东方红战团”的去做，也可能脱离了大多数4 1 4群众的接受程度，会陷于孤立冒险的危险境地。

如果把4 1 4比作一辆战车的话，“东方红战团”与“三七战团”是这辆战车的前后轮。“东方红战团”是前轮，冲锋陷阵，基本决定着4 1 4前进的方向，“三七战团”是后轮，承载者4 1 4的大多数群众随着前轮前进。当然，这里说的前后轮只是一个并不完全贴切的比喻。4 1 4的方向，“三七战团”同样是参与决策的；4 1 4的群众，“东方红战团”也同样承载着。

#### 第十节 “东方红战团”与“三七战团”，4 1 4这辆三轮战车的前后轮

4 1 4总部成立以后，一整套完整的组织体系很快建立起来，从各系建立的分部到总部的各职能机构。因为“4 1 4串联会”在两个月的发展过程中，组织体系已经初成雏形，4 1 4

独立成总部后，再加以扩充完善，组织体系就比较完整了。

在我决心拉着“三七战团”与“东方红战团”搞4 1 4独立的时候，根本没想过在4 1 4总部里与“东方红战团”怎么分配权力的问题。那时头等大事是4 1 4独立出来以后能不能生存的问题。

革委会的流产标志着4 1 4总部生存下去已经没有问题。我和汲鹏既没有权力的欲望，也欠缺组织能力。而“东方红战团”做组织工作的人才济济。尤其是宿长忠，做了大量的组织工作。在总部、分部和职能部门，“东方红战团”的人占优，也有相当一部分是不属于两个战团的教师、干部和学生。既然已经是同舟共济了，我又不擅长搞组织工作，所以没去过问分部和职能机构的组建。而沈如槐、宿长忠也是择优选用人才的。

“三七战团”的人数，也就十几个战斗组一百多号人。“东方红战团”有“三纵队”合并而来，估计人数会超过“三七战团”。我不知道他们究竟有多少人，瞎估计可能有二三百人吧。也就是说，在4 1 4里，绝大多数群众是既不属于“东方红战团”也不属于“三七战团”的。

就团派与4 1 4派相比较，团派是造反派中的鹰派、强硬派，4 1 4是造反派中的鸽派、温和派。而在4 1 4内部，“东方红战团”是4 1 4里的鹰派，观点比较激进，态度比较强硬。“三七战团”是4 1 4里的鸽派，观点比较保守，态度比较温和。

“三七战团”与“东方红战团”都认同“红线主导”论，都反对团派的极左思潮。这是4 1 4的基本观点，也是“三七战团”与“东方红战团”结为同盟的政治基础。但是“三七战团”与“东方红战团”还是有所差别的。

从组织成分上讲，“东方红战团”是由“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演变过来的，他们与“井冈山红卫兵”没什么渊源。“三七战团”是由“天安门纵队”演变而来的，而“天安门纵队”由隶属于三总部的战斗组为促进三总部联合而成立的。“三七战团”里有属于“井冈山”的战斗组（如“第一湘江”），有蒯派（如汲鹏、王允方等）、有我这样担任过“井冈山兵团”总部委员，所以“三七战团”对“井冈山”是有相当感情的。

从政治观点讲，差别主要有两点：

在干部问题上，“三七战团”比“东方红战团”要保守得多。“东方红战团”的胆量与步伐显得更大。沈如槐等在解放干部问题上不断提出一些新观点、新举措。有些观点很有新意，我们很支持的。有一些观点，我们一时也难以接受，于是就保留。还有解放干部的一些举措，如树立吕应中、谭浩强这样的典型，我很支持。但是对刘冰这样的校级“走资派”，虽然我经了解后知道他是工农干部出身，历史上没问题，但我认为在条件不成熟，超越了4 1 4大多数群众的接受程度，解放他的步骤操之过早、过急，反而会陷4 1 4于被动之中。总之，在解放干部的问题上，“东方红战团”无论是在观念上还是在行动上，一直起着冲锋陷阵的带头作用。4 1 4在解放干部上所取得的成绩，主要应当归功于“东方红战团”。“三七战团”努力紧跟、积极参与、适度牵制。在团派极左的强大压力下，“三七战团”对“东方红战团”在干部问题上的右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周泉缨在《必胜》中说：“你们口中‘极右’的叫声愈高，我们愈是感到还‘右’得不够！等我们解决了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问题，再‘右’个样子给你们看看！”<sup>86</sup>〔2—P335〕他所说的“你们”，主要是指团派这样的激进造反派，也多少捎带着是对我们说的。对于“东方红战团”为了与团派的极左划清界线而拼命向右的倾向，我们是十分担心的，生怕4 1 4过于右倾被团派坐实了“右倾复辟”的罪名。

在对团派的态度上，“三七战团”比“东方红战团”要温和得多。“东方红战团”对蒯派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不信任，对蒯派掌权从心里不服气。周泉缨“团派上台就是蒋介石上台”这样极端的观点，在“东方红战团”的核心层中居然也有一定的市场。“东方红战团”的大多数头头都是原来的优质生，他们对蒯派这些政治上的暴发户，对原来的差质生似乎有着一一种斜眼瞧人的轻蔑感。团派与414的对抗，实质上是蒯派与“东方红战团”的对抗。他们之间是互不妥协的。“三七战团”对团派的判断和态度，远没有“东方红战团”那样的严厉和强硬。

正因为有这样两点主要的差别，我，还有“三七战团”，常被个别“东方红战团”的朋友调侃成是“团老四”，意思就是观点和情感都偏向老团的老四。

尽管414绝大多数群众没有在组织上参加“东方红战团”或者“三七战团”，但是在观点上，不是倾向“东方红战团”就是倾向“三七战团”。一个团体中，中间群众总是占大多数的。414的大多数中间群众的观点都是偏向“三七战团”的。但是因为“东方红战团”的头头和战斗组，他们的政治能量和影响力都非常大，在414总部和机构里又占着大多数，所以414的基本走向是由“东方红战团”决定的。“东方红战团”明白“三七战团”这一同盟军对它的极端重要性，所以，对我与汲鹏一直比较尊重。对于“三七战团”所代表和反映的414大多数群众的意见也能倾听一部分，并在行动上做适当的调整。

虽然“三七战团”与“东方红战团”之间有分歧、有争论、有时候甚至偶有争吵，但是有一点最基本的共识。大家都明白的，在团派这个外强的巨大压力下，“东方红战团”与“三七战团”已经同坐到414这条船上。风雨同舟，休戚与共，彼此的政治命运是连结在一起的。共性大于差异。所以414内部，整体而言是团结的。

414总部成立以后，我不知道“东方红战团”是怎么运作的。我对“三七战团”过问得更少了，管理工作都是由高季章、王允方他们在负责。尽管有时候会以“三七战团”的名义发表一些声明或者文章，但是活动已经远不如414总部成立之前了。因为我认为，“三七战团”在观点上与“东方红战团”之间保持一定距离是必要的，但是在组织上，“三七战团”没有必要过多的独立活动，这样对于维护414内部的团结是有利的。

一个组织的核心层里有不同意见甚至有公开的不同两派，只要处理得当，是利大于弊的。当然，首要的一点是这两派的共同利益要远大于各自代表的利益。其次，占优的这派不能以势压人，要尽可能照顾到少数派的利益诉求。少数派也不能处处发难事事计较，更不能面和心不和，搞阳奉阴违的小动作，应该是起建设作用的少数派。我当时就想过，要是414全按“三七战团”的去做，肯定就是前怕虎后怕狼似的温吞水一碗，永远不会有大的作为。要是全按“东方红战团”的去做，也可能脱离了大多数414群众的接受程度，会陷于孤立冒险的危险境地。

如果把414比作一辆战车的话，“东方红战团”与“三七战团”是这辆战车的前后轮。“东方红战团”是前轮，冲锋陷阵，基本决定着414前进的方向，“三七战团”是后轮，承载者414的大多数群众随着前轮前进。当然，这里说的前后轮只是一个并不完全贴切的比喻。414的方向，“三七战团”同样是参与决策的；414的群众，“东方红战团”也同样承载着。

（未完待续）

□ 摘自《良知的拷问》（香港）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3年2月第一版

本期编辑：  
华新民（美国）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思语（美国）

《CND》总编：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 0 2 1 — 8 6 0 2

投稿专用地址: [tougao@cnd.org](mailto: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 [cnd-cm@cnd.org](mailto: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 获取

中文文件: [hxyz-info@cnd.org](mailto:hxyz-info@cnd.org) 英文文件: [cnd-info@cnd.org](mailto: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 <http://www.cnd.org/>

---